

中国大陆妇女学:知识的建构与传承

——30年回眸、反思与展望

杜芳琴¹,王 璿²

(1. 天津师范大学,天津 300073;2. 华中师范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妇女学是特指在高等教育领域以社会性别为首要分析框架,进行知识与机制的批判与重建、生产与传承的研究、教学活动。但兴起于1980年代的中国妇女学,却并不只是单一的在教育机构中进行研究和教学的知识生产与传承活动,而是独具本土特色的关于妇女与性别知识的生产和社会实践。中国妇女学由于缺乏女权运动的社会基础和知识批判的学术背景,因而从起步、发展到理论概念的形成及运作都颇具特点。但中国妇女学又与国际妇女运动、女性主义思想、学术声气相通,本土妇女学学者在密切的国际交流、对话、合作中进行着本土妇女学的探索。30年中,既有研究者在概念、内涵甚至理论路数方面的差别,也有进入21世纪以来妇女在主流化过程中因目标策略不同而形成的多元态势。

〔关键词〕 中国大陆;妇女学;历程与特点;反思与展望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0)06-0001-07

Women's Studies in Chinese Mainland: the Construct and Inheritance of Knowledge

——Retrospect, Reflection and Prospect in 30 Years

DU Fang-qin¹, WANG Jun²

(1.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3, China; 2.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Women's studies refers to research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in higher education which take social gender as primary analyzing framework and carry out the criticism, reconstruction, produ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knowledge and system. Women's studies in China thriving in 1980s is not only production and inheritance activity in solo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but specific production and practice about women and gender. For the lack of social foundations of feminist movement and academic background of knowledge criticism, the start, development, and the formation and operation of China's women studies are of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it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international women movement, feminist ideology and studies. Chinese scholars on women studies exert their exploration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During 30 years, there are deviations in concept, connotation and theory, and multiple tendencies in mainstreaming process because of different target strategy when entering 21st century.

Key words: Chinese mainland; women's studies; process and feature; reflection and prospect

收稿日期:2010-09-20

作者简介:杜芳琴,女,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天津师范大学性别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一、回眸:历程与特点

(一)历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到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简称“世妇会”)之前的中国妇女学起步阶段。该阶段以介绍国外的“妇女学”(women's studies)概念、提出本土妇女学框架和研究现实妇女问题为重点,学科建设和课程开设并未引起关注。

第二个阶段是指世妇会前后,大约在1995年~2000年。这一时期,学界引进社会性别概念,进入“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阶段,仍以现实问题和项目运作为主,学科建设仍被搁置。

第三个阶段从2000年前后开始,此后,中国妇女学真正进入高等教育,开始规模性的学科化探索阶段。这是多种因素推动的结果,也是妇女学学者逐步提高学科意识的结果,认识到妇女学“学科”建设的内涵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极为关键的层面——学术研究、学院建制、师资培训、课程建设以及相关的社会建制、资金资助等。

(二)特点

1. 从问题导向到行动导向,批判性的知识建构被搁置

中国妇女学(研究)缘起不是来源于抽象的理论推理,也不是受到经验驱使,而是有明确的“问题”导向。它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由女权运动引发学术女性主义在大学开展的知识批判和重建,也不同于第三世界许多国家与后殖民主义和民族独立运动相生相伴,它是应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而萌生、沉浮的。因此,长期以来妇女/性别研究并不是以基本学理研究、高校课程建设为主,而是被应用研究、强调活动的项目所取代,直到21世纪初才有改观。

1980年代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带来思想解放、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妇女问题大量涌现,直接催生了新时期的妇女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不是妇女出了问题(如“素质低”),而是社会转型经济调整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牵涉到妇女(如“回家”、“下岗”、“维权”等)。其后,世妇会在中国的召开,使中国在与国际社会的“接轨”中接纳了社会性别主流化议题,以往的“妇女问题”开始转换为“性别议题”;“社会性别主流化”也成了国际社会敦促中国走向新现代性的一个“筹码”,大量资金涌入中国,推动官方

和民间组织开展发展扶贫、生育健康、政策立法、公民社会等行动性项目。进入21世纪,即使在対妇女/性别学科支持的项目中,行动导向也是很明显的。如福特基金会从2006年支持建立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发展网络”就是以妇女学的NGO化、网络化、机制化为目标,以“行动的知识”和“知识的行动”为宗旨,以“实事求是、创新、参与式、可持续、宜推广”为方针^①,彰显了行动导向的特点。

2. 主体多元,利弊参半

在国外,推动妇女学的力量主要以高等院校的教师为主;而中国参与妇女学研究教学的人员主要由四方面构成:(1)妇联系统;(2)社会科学研究系统;(3)高等院校;(4)中央及地方各级党校系统。这支多元化的研究与教学队伍(绝大多数是女性),是中国特定体制的产物。妇女学是在高等教育系统中进行的知识批判和重建,由于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是教育系统(普通高校),也分布于社会科学研究系统、党政系统、妇联系统中,又由于在中国有“性别议题妇女化”、“妇女事务妇联化”的新老传统,所以就演化成妇联主导的“四位一体”的妇女研究和学科推进的格局。

“四位一体”的优势是能够集结力量,带来丰富的信息,妇联与党校系统的参与,能够在学科建设的主流化和学术应用方面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社会科学研究系统的学者,则带着深厚的学科积累和对现实问题的密切关注使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一直扎根本土。但是,这样复杂的主体成分和不同的目标诉求会在需求满足和兴趣上发生偏离。妇女学在高校要承载的知识生产/传承的使命,与党校、妇联系统的政策干预和行动的任务不完全合拍同步,整合与协调存在一定困难。

作为主导者,建立基地只是妇联推动社会性别主流化(包括教育、社科研究、立法、决策等领域)的一部分,且重点在决策和立法研究;至于在学校进行的知识建构与传承,能得到的支持无论是经费资源还是行政资源仍然很有限,至少在纳入教育主流方面成效不大。至今,“四位一体”的基地没有得到教育部门(特别是教育部)的明确支持的表态,经费支持和学术地位的承认更无从谈起。

3. 机制建设长期滞后

中国妇女学对学科建制的普遍无意识,导致机制建设的滞后。长期以来,妇女学的机制化并未受

到应有的重视,一些学者甚至想绕开高校机制建设,达到妇女学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众所周知,国外妇女学是由妇女学研究中心或系负责开设课程和培养学生的,而中国高校妇女/性别研究中心数量少、建立晚、定位模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未能成为妇女/性别研究的载体,至今也只有极少实体机构和专职人员。妇女学机制建设远远滞后于学科发展的需要,以至在进入21世纪妇女学学科建设得到发展机遇时,只有通过课题运作的方式来集结学术队伍,靠举办某学科和跨学科的研讨会、读书会来整合、培训研究和教学骨干,反过来促进妇女学实质性的组织建制。至今,很少有关于机制建设的讨论,更多的妇女学学者没有把专职化、实体化当作机制推进的重要手段,仍把虚体、渗透作为主流化的机制策略。

以上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大陆妇女学的发展走向和目前所能达到的水平。

二、反思:概念、内涵与理论策略

(一) 概念翻译及内涵

命名不是随意的事,名称的背后往往反映各自所持的理念和策略。Feminism 在中国较为普遍地被翻译为“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Women's Studies 于1980年代初引入中国就有不同的翻译——“妇女学(研究)”和“女性学(研究)”;1990年代 gender 概念引入中国被翻译成“社会性别”,也有简化成“性别”的。到了19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关于 gender 一词的“社会性别”与“性别”的翻译和使用产生了分歧,表现在学科术语上新增了“性别(研究)”和“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的不同命名。究竟这些称谓是怎样被翻译、“制造”和使用的?谁在使用?在汉语中的内涵是什么?背后支撑的学理又是什么?想传达哪些知识?这一探讨有助于对中国妇女学在知识生产中复杂性的理解。

1. 关于 Feminism。“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Feminism 开始传入中国,当时人们把它翻译成“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女子霸权主义”、“男女平权主义”、“女子主义”、“妇女主义”、“弗灭涅士姆”(音译)等等,其中“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最为常见。但是,直至今日,几乎所有的译者都认为还未找到对 Feminism 最恰当的翻译。在目前还没有更好译词的情况下,国内绝大多数译者和研究者在“女性主义”或者“女权主义”两者之间作了选择。

选择“女权主义”作为译名的主要是基于凸显

争取女性的权利,进而取得权力,认为“女性主义”的翻译过于强调文化而削弱了权利和权力。目前使用“女性主义”的译名最为普遍,但使用者内部也存在认识上的差异:有学术的女性主义、行动的女性主义、微笑的女性主义等之分。学术女性主义以在大学推动妇女学的学者为代表;行动的女性主义以妇联和妇女 NGO 的活动家为代表;最近,标榜温和、趋于时尚的“微笑”的女性主义也很有市场。

“学术女性主义”认为,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已对“女权主义”这一概念存在太多的偏见和误读,认为“女权主义”的“权”字作“权力”、“权利”解,就是女性不顾一切地向男性争夺权力,甚至去谋求女子霸权;但是现在谈论“Feminism”并非仅是简单地从权力或权利层面来突出女性的权益,特别是现当代女性主义在与各种文化理论对话、挑战不同的学术思想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强化自身理论体系并谋取在学院中的地位,特别强调其作为文化资源的重要意义。所以应该有一种新的译文来凸显其新的意义与内涵,认为选择“女性主义”的译法是能言尽其意的。

“行动的女性主义”主张更多关注现实妇女运动,认为对现实妇女重大问题,通过调查研究,形成政策建议与立法提案才是要务,全国妇联主流研究者可以归入倡导性行动女性主义;还有更多属于公民社会层面的 NGO,包括更具草根性的民间组织,其更注重对妇女和弱势群体进行赋权式的干预、服务和组织活动。

“微笑的女性主义”则认为中国女性主义是犀利的,但并不是咄咄逼人,它探讨女性问题,关怀两性的和谐发展,并最终关注“人”这一永恒命题,它是学理与时尚兼具,同时具有市场运作特点的女性主义。

也有研究者认为,把“Feminism”翻译成什么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在这个称谓下我们想做什么,我们在做什么,我们能够做什么。

2. 关于 Women's Studies。“女性学”是当前最常见的命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妇女学队伍的新老交替,凡称“女性学”的,都会与“社会性别”牵扯上;但退回8年前,“女性学”承载的理念和学科背景还是众说纷纭,在研究对象、目标和分析框架等方面皆存在差别。这里重点举出两家:

第一,“社会性别”框架。1999年天津蓟县研讨

会以“赋历史研究以社会性别”为旗号,可视为社会性别框架的中国妇女学的发端;2000年“发展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课题启动后,用社会性别赋予社会学、历史学、教育学、文学……渐成气候;第一本以《社会性别与妇女发展》命名的教材也反映了这一分支的理念倾向,但态度鲜明地“提出把‘社会性别’(gender)作为研究社会现象的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和解释框架”的是中华女子学院的《女性学导论》^②,全书的体例内容包容了国内外妇女学与社会性别研究的基本范畴和成果。该导论式教材中的“女性学”实际是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妇女学或女性学,只是考虑到女子学院学生接受的习惯才叫“女性学”,因为女学生不喜欢政治色彩浓厚而又多指已婚女人的“妇女”这个词。

“人学”框架:以北京大学的《女性学概论》为代表^③。本书认为女性学不仅是从女性的角度对女性的再认识,更是从人的角度对人的重新诠释;其“逻辑结构”是“从‘人’切入,以‘男人’为参照,对‘女人’聚焦”;这是一种男女交融汇聚的人文视角;目标是“描述完整的图景”,进而描述“完整的人类图景”,以达到“重建人文科学”的宏大目标。这是人学框架下的追求“科学”的、“整体”的、“一般”的、“本质”的、“超越社会关系”的“规律”的女性的“女性学”的典型表述。

此外,还有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简称“马妇观”)指导下的女性学和为真正“女性”服务的女性学(如“让女人更像女人”、“活得更美丽、更精彩”,为此开设“女性的着装与化妆、女性人生与形象设计”等课程)^④。前者强调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性,后者强调女性气质、女人味的打造与训练的实用性——市场的双重接纳——女人消费和消费女人。

3.“妇女学”是又一种重要的命名方式。由于在中国语境中,“妇女”一词有特殊意义——一是因与妇女运动、妇女解放牵涉而被认为政治性太强,二是因特指“已婚”和“家庭中”的女人而被现代新女性(包括女学生)所不屑,这是后话。Women's Studies的中译——“妇女学”最初(1982年)是被妇联界和学界双双接纳的,与张萍的“女性学”翻译并用,并无歧义。世纪之交,妇女学者才有了比较明确的妇女学的定义:(1)是在高等教育中进行的有关妇女/性别的研究与教学的学术和教育实践活动,是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批量的有关妇女与性别知识

生产与再生产,需要研究、课程、机制和服务社会等系列环节和过程;(2)是在伦理价值观方面倡导一种平等、合作与和谐精神,不但消除性别歧视,更旨在消除一切歧视和不平等,提高妇女和人类的尊严和生活质量;(3)是一场关于知识论(认识论)和思维方式的变革,克服二元对立的、绝对主义的、本质主义的、普世主义的思维模式,树立多元共存、理解合作、流动发散的认知思维模式,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关注人类终极关怀^{[1](P18-19)}。

4.关于gender、妇女/性别研究。gender从1990年代初出现在中译文本,皆以“社会性别”名之^⑤。社会性别一词在使用中被发展界、学界和女界广泛接受;即使学界偶有把它替换为“性别”,也不会引起歧义。从本世纪开始,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的创建人李小江坚持主张把gender翻译成“性别”而非“社会性别”,她认为本土词汇中“原本有两个词——‘性’和‘性别’”,“性”是“自然的”,“生理的”,甚至有“人性的”意味;而“性别则主要是社会的,是个体身份的一种标志,也是社会秩序的基本成分”;如果将gender翻译成“社会性别”,不但排斥了“自然的性”,使“个体的和自然的身份又一次人为地隐而不见了”;也造成麻烦,有蛇足之嫌^[2]。李小江从1987年成立首家妇女学研究中心到2000年创建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这其中“妇女”到“性别”的变化,与她的gender的中译主张一致,也与她总结自己以往的经验有关。她说,“性别研究”这个名称的好处不但易吸收男性教师参与,而且就学科本身而言,从“妇女”走向“性别”,除了消解“妇女学”过强的政治性、冲破单一性别的狭隘外,更具有作为一种学术渗透的方法,融合到其他学科中去的优势。她坦言自己决心远离妇女学的政治性,向“性别研究”的“学术路线”靠拢,是为了平等地与学界对话,客观地研究事物的真。在最近接受的访谈中,她的这一看法更加系统理论化了。她解释说,妇女研究就是以妇女为研究对象、站在妇女的立场争取妇女的解放,以使妇女获得更好的生活为目标;性别分析是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上去看,会看得更公正一些,因为性别分析是没有偏差的,就像我们说阶级分析方法没有偏差一样^[3]。看来,最根本的是认识论上的分歧,才导致翻译和概念用语的不同。

而留美学者中力主将gender翻译为“社会性别”的王政则认为,中国过去的词语中,只有古代的

“男女”具有性别的含义,现在大家理解的“性别”在中国就是一个生理符号,只有社会性别才能传达出该英文词的丰富内涵^[4]。看来这里面的学理差别远远大于跨文化翻译上的困难。

5. 妇女与社会性别学。从2000年启动的由福特基金会支持的“发展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课题组,用“妇女与社会性别学”为在中国这一新兴的 women's studies 命名;课题总牵头人杜芳琴认为:“‘妇女学’与‘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的关系,只是发展阶段和认识上的深化,妇女学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不能就妇女论妇女,而是要看到性别的关系及其与其他关系的联系……‘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的命名也是吸取了国外妇女学发展的经验——一方面关注妇女但又不拘泥一个性别,将男女置于社会性别关系与其他系统的关联中去考察;另一方面在关注社会性别议题时不至于将妇女淹没,而是要看到围绕着性别议题形成的各种权力关系,还要顾及到用社会性别作为基本观察视角和分析范畴时,不致忽视其他分析范畴如阶级、阶层、民族、地域、年龄、教育等因素。”^{[1](P13)}这种认识实际上就是为了特别强调在用社会性别(gender)概念对本土妇女/性别领域进行知识批判和重建的过程中,始终把妇女作为主体并置于中心地位,坚守“妇女”主体而从性别和更多范畴看权力关系,从而有意与把女人作为客体、宣扬“女人味”话语和不加分析地将中国的性别关系说成是“阴阳合和”的理念划清界限^[5]。

学术概念的根本特征就是带有哲学(逻辑)的规定性,带有来自学科共同体的种种制约,它是一个成熟学科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但是,目前中国大陆的妇女学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要求。关于“妇女学”翻译、概念和理论内涵的探索与争鸣一方面深化了妇女学的学理研究,另一方面也说明,要促进中国妇女学的建设,建立成熟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尚有大量基础性工作要做。

(二)理论策略

妇女学的蓬勃发展是国际性的学术趋势,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谈妇女学的全球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又强调不同地域、国家、民族在性别文化和解决问题的独特性,在普遍的相似性与无限的多样性之间寻找联结。在中国由于妇女学在理念上的差

别,直接导致妇女学运作与策略——“本土化”以及连带而及的主流化的不同主张。

1. “本土的”与“本土化”。在中国,尽管没有人否定发展中国的妇女学需要引进甚至向西方女性主义学术学习,但对妇女学的“本土化”颇有争议甚至有点敏感:它可以成为抵抗“西化”的民族主义话语,也可以代表主流学术甚至官方意识形态在妇女学界发声,更可能成为建立本土妇女学的有用策略。

一种意见以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性别论坛”为代表,认为“本土资源”,一是指“这个土地”固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包括古代阴阳互补和谐的性别关系、近代以来的男女参与了的妇女解放与男女平等的历史遗产;二是“本土经验”——在世妇会前尚未与“国际接轨”时,已经创造了“本土的”妇女学经验,包括理论上将性别从阶级范畴中的剥离,组织上的“纯民间”的“自下而上”的(与官方划清界限)男女学者一起参与研究,独立于西方女权主义的研究成果(与西方划清界限),更应包括2000年以来在大连大学学区创造的整合女性主义视角进入大学课程和活动的经验^[6]。

另一种本土女性学常用“中国特色”来表述,一种观点认为它应该“是人学的一部分”,“作为一种理论和知识体系,是研究整体人类中整体女性的本质、特征,及其生存和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7]。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再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这两种以建立宏大体系为目标的妇女(女性)学尽管看来很有理论市场,但在学术推动方面收获甚微。

还有一种意见是,认为妇女学的全球化、区域化与本土化是连在一起的,不同地域身份的学者会提出不同的全球化和本土化。21世纪的中国妇女学出现了围绕着本土化的纷纭论说。

第一,在特殊与共性之间平衡的本土化。有学者认为,本土化并不是强调特殊,而应看到普适与共性,“化”不是照搬和移植,而是从本土出发吸纳借鉴更广泛的经验^[5]。正如许洁英所认为的,关键在于界定什么是本土化,而是为什么提出本土化,不应“因国情不同”而拒绝外部经验,为了让妇女学在中国成活、发展壮大而使普遍性(共同的目标、准则,即学理部分)适应独特性(不同的土壤),甚至有时还需要改良土壤^[8]。拒绝借鉴,只强调“特色”不看“共同”和“相关”,必然走向封闭和僵化。

第二,本土化等于中国特色化。其一,有一种说法曾一度流行,认为“本土化就是民族化、地区化、特色化;具体到中国就是中国特色化。”何谓中国特色?论者认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教学和研究方面的状况”,强调“状况”;其二,本土化就是“化他国之经验”,先有一种可供本国学习的东西,然后才有本国的介绍、翻译、学习、融化,强调“消化与融化”,类似于“XX主义中国化”^[9]。

第三,“本土化”等于“化西方”。换一种说法,即所谓“本土化”,它强调的不是“本土”,而是“化”,是化西方,即西方的价值体系在其他土地和人群中的普及和渗透,女权主义的本土化,在实践过程中就是一个力图全面西化的过程^[6]。这种忧虑看来多余,从目前妇女学的发展来看,已经开始真正扎根本土,在引入概念、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创造本土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正在形成学术女性主义与行动女性主义的合作,为探索跨学科、跨界域的将研究与政策倡导、行为改变的结合进行着尝试^⑥。

2.“桥梁”与“越界”。在中国妇女学的建设过程中,海外华人学者在其中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桥梁和纽带。在全球化背景下学术与理论的跨国旅行中,这些“根”在中国的侨居者、在西方学习了妇女学的女学者,具有多重的而又流动变化的身份。随着中国妇女学的成长,不少人在不断调整自己的角色和作用。

从1990年代初以海外中华学会与国内合作举办系列研讨会,到如今分别以专家身份与高校、妇女组织合作,开展研究、教学和项目,方式多样,各具特色,不论集体搭桥,还是个人越界,都有自己的主体性,同时也有各自的局限,选择与适应,互惠与多赢,平等与尊重,是坚守的原则。盲目的抗拒和自傲都产生于背离原则,会消解建设中国妇女学的合力。笔者最近偶翻一本杂志,读到这样的一段话:“学会成立时,我们想成为沟通东西方学术交流的桥梁,后来我就不喜欢这个‘桥梁’,因为当成了被利用的工具……我不喜欢被利用,完全工具性而没有主体性。……而‘越界’就是跨越各种各样的界限,我本人可以跨越各种各样的界限,因为我是一个有主体性的人,一个力图突破各种障碍、跨越鸿沟的女权主义行动者!”^[4]每个经历了中国妇女学建设的人,都不希望因为个人的越界,而抛弃海内外中国妇女学者共

同搭建的友谊交流之桥梁。

三、展望:妇女学主流化的目标与策略

(一)主流化目标

1. 学术合法化。这是繁重长期的任务,需要在三个方面用力:第一,清理已有的知识遗产,对有意无意或貌似中立的抹煞、忽略、曲解妇女和性别关系真相保持警觉,如动辄用“阴阳和谐”、“两性互补”消解对传统性别权力关系的揭示,甚至提出以两性和谐的建构取代对知识权力关系的批判。第二,警惕当今知识生产中的权力关系,在全球、区域和本土之间妇女学文化旅游中认识共性理解差异;下力气改善目前信息不对称,引入西方多,了解近邻少,本土情境化知识、理论、工具严重匮乏的状况。第三,抵制教育市场化商品化对学术的侵蚀和对妇女的物品化,警惕高校女性特质教育的升温(如“淑女教育”)和女性出版泡沫化的趋势。

2. 行政合法化。妇女学知识生产与传承的主要场所是高校。妇女学要生存发展必须进入高校的体制——学科、课程与教学序列和行政系列。在中国,妇女学主流化和可持续的真正动力在于学校的内部建制、机制创新,然后(或同时)被教育主管部门认可。目前,行政合法化比学术合法化更要紧迫。

3. 社会合法化。在前两个合法化的过程中,才能提供高质量多方位的服务,进一步取得所在学校和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认可,使服务对象学生、广大妇女和社会获益,同样也会得到所有合作者与支持者的理解——社会合法化的实现也正是妇女学的最终目标。

(二)主流化策略

1. 学理研究与行动研究结合。学理合法化是学科合法化的核心,在存在学理纷繁复杂现象的情况下,应该向最基本的学理认同努力,如研究对象,公认的专门术语和方法论、概念体系、分析范畴等等达到基本认同。要唤起研究者的理论关怀,沉静下来做艰苦细致的基础性工作,真正提升妇女/性别研究的理论品性以及“妇女/性别研究作为学科”的地位和尊严,使之拥有相应的学术权力和话语权,并为促进妇女学的“建制化”奠定坚实的学理基础。同时,妇女学学者要树立社会关怀,将学院研究与行动研究(包括政策倡导与社会变革行动)密切结合,创建校区、社区、政府之间的合作模式,实现跨学科、跨界

域解决重大社会议题中性别平等和公正的目标。

2. 批判性知识建构与课程建设。课程建设与教学是妇女学学科化教育的核心和基本手段。妇女学学者已深刻地意识到要想从根本上消除教育中的性别歧视,就必须触及到那些仍然在学校课程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知识形式和认知方式,通过妇女学课程的介入与影响,以消除知识领域的性别歧视与性别偏见。在中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轨的过程中,妇女学课程有更多问题需要面对,如目前高等教育在如火如荼的商业浪潮中,如何将“市场知识”和“社会知识”加以区分,面对就业机会上出现的新的女性歧视人们只是被动适应的状况,妇女学的课程设计者和生产传授知识者,就应特别具有反思批判和对抗市场知识对人的侵蚀的警惕。另外,妇女/性别研究课程在进入高等教育体制的过程中,来自社会形形色色的传统观念、学术界本身的规则以及教育体制自身的固步自封等因素都可能制约着其发展。在现代教育制度依然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如何拓展妇女/性别研究课程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的影响,推动中国大学课程的改革仍是任重道远。

3. 尝试多种形式的建制模式。在中国,发展妇女学最基本的学理建设、课程建设也非常关键和必要,但是从策略上讲,“学科制度化”,即妇女学在制度建设中取得合法性应被视为第一要务。目前,在中国妇女学学科化进程中,无论是“自治”还是“整合”、“渗透”,都有它们存在的合理性,中国妇女学的建制绝不会按照同一种模式进行。依据自己的实际发展情况来谋取合适的生长空间,多种建制形式并存的态势可能是中国妇女学长期的现实。尽管跨学科的建制才可能是最接近妇女/性别研究跨学科的学术和社会使命的建制方式,但是,这种没有学科归属和学科依托的跨学科建制机构在未来的发展中可能面临的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密切关注和深入探讨。对于中国妇女学来说,推动妇女学学科建制的实现仍是漫漫长途。

注释:

- ① 福特基金会教育项目官员多次强调的妇女学运作15字方针。
- ② 前书郑新蓉、杜芳琴主编,2000年1月,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后书韩贺南、张健主编,2005年2月,教育科学出版社。

出版社。

- ③ 魏国英主编,2000年12月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 ④ 如首都师范大学编写的《女性学》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指导的代表,主编之一翟大鹏认为“女性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指导地位”,王金玲等主编的《妇女学教学本土化——亚洲经验》,39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另一种以女性学标榜的培训女人更像女人的课程,见强海燕、韩娟的《大陆高校性别意识教育的演进》,莫文秀等主编的《妇女研究蓝皮书:中国妇女教育报告》,31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 ⑤ 最早将gender翻译成“社会性别”的是海外中华妇女学会,见《中国妇女与发展——地位、健康与就业》,6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 ⑥ 从2008年开始,国家计生委支持的以中央党校妇女/性别研究培训基地为集结地,来自高校、党校、社科系统、妇联、NGO的学者、教师、活动家共同参与的“在关爱女孩行动中开展社会性别平等培训”课题就是新的尝试。笔者将有专文详细介绍。

参考文献:

- [1] 杜芳琴. 全球视野中的本土妇女学——中国的经验: 一个未完成的过程[A]. 妇女学和妇女史的本土探索——社会性别视角和跨学科视野[C].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 [2] 李小江, 等. 文化、教育与性别· 导言[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 4-6.
- [3] 刘宁, 刘晓丽. 从妇女研究到性别研究——李小江教授访谈录[J]. 晋阳学刊, 2007, (6).
- [4] 荒林. 中美比较的女权主义的现状与未来——密西根大学王政教授访谈录[J]. 文艺研究, 2008, (7-8).
- [5] 冯媛, 杜芳琴, 等. 称谓· 理念· 策略——中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学五人谈[A]. 杜芳琴. 社会性别(第一辑)[C].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4. 12-13.
- [6] 李小江. 50年, 我们走到哪里?[J]. 浙江学刊, 2000, (1).
- [7] 李静芝. 中国特色与妇女学[N]. 中国妇女报, 2002-12-16.
- [8] 许洁英. 共同的目标, 不同的历程——妇女学教学本土化的两点思考[A]. 王金玲, 韩贺南. 妇女学教学本土化——亚洲经验[C].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4.
- [9] 潘锦棠. 妇女学教学本土化——亚洲的经验国际研讨会论文提要[Z]. 内部资料, 中华女子学院, 2002. 6.